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介绍到传播

林代昭 潘国华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体系，是革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行动指南。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伟大胜利。如今，我国人民正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满怀信心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

中国人民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是经历了长期艰难曲折道路的。起初，中国的先进分子只是在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过程中，接触到欧洲社会主义各种流派，从中知道了马克思的名字以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零星片。当时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是十分粗略的。并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学说区别开来。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并不以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可以实行的。经过反复的推求比较，到了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具备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政治、经济、思想条件，马克思主义才在中国真正传播开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介绍到传播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是最富有生命力的科学理论，它在中国传播和胜利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集中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奋斗目标和基本主张。如同马克思主义在其他国家传播一样，中国人民接触马克思主义，首先也是从社会主义理论开始的。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研究重点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最初是被看作社会主义一个流派介绍到中国来的。经过长期的斗争，尤其是经过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多次论战，马克思主义才作为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开来，并取得了胜利。学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介绍到传播历史可以系统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增强我们对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能力，提高与一切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斗争的自觉性。

建国以来，随着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研究也有很大的进展。但是，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的研究，特别是早期传播的历史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下面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和传播作一简略的概述。

* 本文为作者编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介绍到传播》一书的前言一部分，该书约六十万字，分上、下册，最近将由出版社出版。

(一)

马克思主义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形成的。一八四八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其形成的主要标志。

《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的第三年，中国掀起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提出过废除私有财产的纲领，但是，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与科学共产主义并无任何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太平天国和中国革命的许多论述，当时的中国人也一无所知。

中国人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年。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现代工业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无产阶级尚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缺乏必要的条件。但是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开始没落，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的一些有见识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开始看到资本主义的许多弊病，产生了对资本主义的种种疑虑。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的各个政治派别纷纷从事对社会主义的研究和介绍，企图从中吸收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正是作为欧洲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派别在这个时期被介绍到中国来的。

诞生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学说，开始为中国人民所知道，日本这个中间站曾经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社会主义不仅“披靡欧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回旋激荡，而且已经越过重洋，猛烈冲激中国东邻的日本列岛，“轰轰于东西洋”。^①早在一八七〇年，社会主义这一名词就已经被介绍到日本。一八九八年，日本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日本第一个宣传社会主义团体“社会主义协会”。到了一九〇四年，《共产党宣言》的日译本在日本出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在日本开始传播开来。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蓬勃发展，在中国引起了重要的反响。中国的许多早期马克思主义介绍，主要是接受了日本社会主义者片山潜等人的影响。有的介绍是直接从日本的社会主义书刊中转译过来的。

中国报刊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一八九九年二月上海《万国公报》发表的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②一文。该书在介绍西方各种政治学说时，多次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并指出：“近世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恩，主于资本者也。”文中所谓“安民新学”说的就是社会主义学说，“主于资本者”，指的就是马克思对“资本”的研究。

一九〇一年一月，中国留日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编译的《近世政治史》一书在介绍社会党和第一国际的由来时也附带提到马克思和社会主义。该书指出：“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各国工人之首领，均集于万国工人总会（即第一国际——编者按）”，麦克司（即马克思）

① 《万国公报》是基督教在上海设立的出版机构广学会发行的一种刊物。广学会于1887年成立，创办人是英国传教士韦廉士。1890年以后，该会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主持。

② 《大同学》原本是英国进化论者颌德(Benjamin Kidd)的《社会演化》(《Social Revolution》)，全书共十章，《万国公报》在121—124期节译前四章。同年，广学会又将该书十章译出后汇集成书出版。

“总理全体”。该书还解释说：西国“为仆工者，往往受资本家之压制，遂有倡均富、制恆产之说者，谓社会主义。”^①这是在中国报刊上第一次使用“社会主义”一词，并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联系起来。

从一九〇一年以后，《新民丛报》、《政艺通报》、《翻译世界》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报刊陆续刊载了一些介绍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文章，他们承认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鼻祖”，指出“社会主义为今日世界一最大问题”。^②一九〇三年二月，上海《新世界学报》刊载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译文中以较多的篇幅介绍了欧洲社会主义的各种流派。作者指出，“近世社会主义，自塞西贫笃西孟（即圣西门——编者按）阐明之，而显彰于考鲁玛克斯（即卡尔·马克思）”“尔后渐入实际问题，而不如前之哓哓于空论矣”。^③

资产阶级改良派对马克思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是在“牖新知”的旗号下进行的，是他们向读者介绍西方各种政治学派时附带提到的。对此，他们并无厚爱。他们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介绍也是零碎的、片断的。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改良派并不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是可以实现的。梁启超就明确表示：“极端之社会主义（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微特今日之中国不可行，即欧美亦不可行。”^④但是为了逼迫清政府接受他们的主张，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社会主义介绍也罗列了一些欧美社会主义革命的事实，说了一些称赞马克思的话。这样，这些社会主义介绍，就成了中文报刊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最早记载。

资产阶级改良派不仅评述介绍社会主义学说，而且出版数量众多的国外论述西方社会主义各种流派的专著。在这些论著中也或多或少地提到了马克思的学说。例如一九〇三年改良派主办的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赵必振翻译日本人写的《近世社会主义》。书中的一章《加陆马陆科斯（即卡尔·马克思）及其主义》，简介了马克思的生平活动及其学说。该书提到了《共产党宣言》的产生和内容，并引用了它的最后一段话，译文是“同盟者望无隐蔽其意见及目的。宣布吾人之公言。以贯彻吾人之目的。惟向现社会之组织。而加一大改革。去治者之阶级。因此共产的革命而自警。然吾人之劳动者。于脱其束缚之外。不敢别有他望。不过结合全世界之劳动者。而成一新社会耳。”显然，译文与原文出入很大，有严重的歪曲与误译。但就现有资料来看，这是《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一段译文。

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是马君武。一九〇三年二月，马君武在《译书汇编》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⑤一文，作者在介绍了社会主义学说及其发展历史时提到了马克思及其学说。他指出：“社会主义诚今世一大问题之最新公理”，它“发源于法兰西圣西门Saintsimon佛礼儿Feurier，中兴于法兰西人鲁意伯龙Blanc、布鲁东Proudbon，极盛于德意人拉沙勒Ferdinand Lassalle，马

① 《译书汇编》，第二期，1901年1月。

② 杜士珍：《近世社会主义评论》，《新世界学报》，1903年2月。

③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1904年。

④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1904年。

⑤ 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译书汇编》2年11期，1903年2月16日，该文所附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是用西文写的。

克司Karl Marx”。文章称赞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学说，指出，“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释）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文章附录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附有马克思著作的目录，例举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五本书。《书记》所附的马克思著作目录不仅是近代中国第一份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史的书目，也是迄今为止在文字记载上所见到的中国最早的马克思著作书单。从这份书单可以看到在一九〇三年，中国人不仅接触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光辉著作，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其它一些重要著作如：《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等也有一定的了解了。

一九〇三年八月，我国留学生在东京出版的《浙江潮》发表的《新社会之理论》一文中在介绍社会主义学说时，也提到了马克思。作者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列为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重要派别，并作了简要的介绍，指出，共产主义“是派创于法人罢勒（Baboeuf），其后则犹太人埋蛤司（Karl Marx），今之万国劳动党见其象也。”“其原理曰：土地与资本，生产之资也。若地主、若资本主何需乎？”“故必废私有相续制而归国有”。^①当然，作者还分不清科学共产主义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基于他的小资产阶级立场，文章也称赞了极端民主主义即无政府主义。把极端民主主义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并列为欧洲社会主义两大流派，这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介绍的通病。

一九〇五年，以孙中山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从此，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从一九〇六年起，同盟会机关报《民报》陆续刊登了一系列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文章。一九〇六年一月和四月，《民报》第2、3号连载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理论家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该文不仅第一次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迹，而且全译了《共产党宣言》的十项纲领。同年五月，《民报》第4号刊载了《民报》社社员翻译的《欧美社会革命运动之种类及评论》。文章称道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指出，“社会主义之大目的，在以土地、资本……公诸社会。”“此其学说创自德儒卡玛（Karl Marx）（即卡尔·马克思）殷杰（Engles）（即恩格斯）二氏，近乃风靡全欧”。六月，朱执信在《民报》第5号上发表了《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文章在谈到社会主义学说时指出，“自马尔克（即马克思）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社会主义（Scientific Socialism）。学者大率无致绝对非难。”一九一二年十月，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总部发表演讲《社会主义派别及批评》。在他的社会主义讲演中，赞扬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认为“马氏之资本公有，其学说得社会主义之真髓”，指出：“厥有德国麦司（按：即马克思）者出，……著《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②

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资产阶级革命派是抱着预防资本主义流弊的主观愿望来提倡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

① 《浙江潮》，1903年第8期，1903年10月。

② 孙中山：《社会主义之派别及其批评》，《总理全书》，《演讲集》。

义的。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弊病在欧美已经积重难返”,“社会革命其将不远”,而在中国却“去之易”,^①因此可以不经无产阶级的革命,就可以实行社会主义。这就从根本上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他们的社会主义纲领,就是征收地税和实行铁道、电气、矿山等大企业由国家经营。这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纲领,而是“想用各种万应药方各种补缀办法来消弥社会灾难,而不毫伤及资本和利润”的资产阶级纲领。^②

第二,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但是他们认为纯粹的共产主义,“今日不能即行”。他们提倡的社会主义“为国家社会主义”,^③即资产阶级的国有主义。他们介绍和称赞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只是为了论证他们的“社会主义”非常“温和”,不会触及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尤无难行之理”。^④

第三,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把马克思主义纳入资产阶级的轨道,还散布各种错误观点来曲解科学社会主义。例如有的文章把资本简单地归结“为掠夺之结果”,^⑤把科学社会主义与蒲鲁东的财产就是盗窃的观点混同起来。有的文章把社会主义说成阶级调和的理论,认为可以依靠共和政体即资产阶级共和国来“除豪族”、“平均财产”。^⑥有的文章否定社会上存在阶级,说什么“今惟扑满,而一切阶级无”。^⑦可见他们介绍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他们主张的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他们正是根据资产阶级的需要,按照资产阶级的立场去任意解释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

1907年以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和刊物也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一九〇七年八月,由张继、刘师培等人发起,我国留日学生成立了“社会主义讲习会”。讲习会是一个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团体。但是在介绍马克思主义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一九〇七年十二月,社会主义讲习会机关刊物《天义》报第13、14卷刊载了《共产党宣言》关于妇女问题的论述,并由该报主编何震写了按语。《按语》说,马氏(指马克思)等所主共产说,虽与无政府共产主义不同,而此所言则甚当。”一九〇八年一月,《天义》报第15卷刊登了恩格斯一八八八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写的序言,并预告读者:“宣言全文由民鸣君译出,另有下册增刊号载之。”以后,虽然未见刊登《共产党宣言》全文,但仍然刊载了《共产党宣言》的前两章。《天义》报第16至19卷合刊还刊登了刘师培为《共产党宣言》写的序。作者简要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的经过,并推崇宣言说:“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编”。这期合刊的《女子问题研究》一文还摘译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一些段落,并且指出,观于彼说,则“女子欲求解放,必自经济革命始,彰彰明矣”。此外,这期合刊还摘译了英国社会党领袖海德门的《社会主义经济说》第一章,译者在《识语》中赞扬马克思在推动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方面的卓越功绩,指出:

① 孙文:《民报发刊词》,《民报》第1号,1905年10月20日印刷。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44页。

③④ 朱执信:《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民报》第5号,1906年6月。

⑤ 朱执信:《德意志老革命家小传》,《民报》第2号,1906年2月。

⑥ 叶夏生:《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民报》第7号。

⑦ 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3号。

“自马尔克斯以为古今各社会均援产业制度而近，凡一切历史之事实，均因经营而殊，惟阶级斗争，则古今一轨。自此谊发明，然后言社会主义始得所根据，因格尔斯（恩格斯）以马氏发见此等历史，与达尔文发见生物学，其功不殊，诚不诬也。”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团体是在所谓“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有共同的神髓”这种错误认识的基础上，来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凡是自认为与无政府主义没有冲突的观点，他们是可以接受的；反之，凡自认为与无政府主义相抵触的观点，他们则加以反对。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立场出发，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认为只要承认无产阶级“国家之组织”，“由是共产之良法美意亦渐失其真”。^①反对马克思主义把共产主义分为初级、高级二个阶段，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在生产资料公有的前提下，允许个人具有生活资料是“根本上已背乎社会主义之定义”，^②甚至荒谬地提出，从社会主义实行之时开始，凡社会之物如衣食房屋之类也必须统统公有，这才算彻底的社会主义。刘师复这种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早被马克思主义批判过的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的陈词滥调重弹。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获得多少“知音”。到了五四以后终于被抛入了历史的垃圾堆。

民国建立以后，江亢虎领导的中国社会党也介绍过马克思及其学说。中国社会党的前身是一九一一年七月十日在上海成立的“社会主义研究会”。辛亥革命爆发以后，社会主义研究会于十一月五日改名为中国社会党并推举江亢虎为部长。中国社会党成立前后出版了刊物《社会星》、《社会党月刊》。此外，各地支部也都有机关刊物发行。这些刊物在介绍社会主义学说中间，曾经提到马克思的学说。例如，社会党绍兴支部机关刊物《新世界》第二期曾经刊登了《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③这是中国第一篇把马克思学说作为社会主义理论主要代表的译述。该文称赞“马儿克精密思想”，指出马克思的学说是“社会主义之学说磅礴郁积、社会党之势力澎湃瀾漫，能使全世界大多数之人类均棲息于是旗帜之下”的根本原因，认为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不啻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之引导线、大同太平新世界之原动力”。作者在文章中除了介绍马克思的传略、《共产党宣言》的概略以外，还介绍了《资本论》的一些内容，指出：“马儿克《共产党宣言书》以外，他之著述甚多，而其学理之论议为世界所宝贵者，则资本史与《资本论》是也。”此外，《新世界》在同年还连载了恩格斯的重要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原译名为《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这是该书在中国最早的译本。

但是，中国社会党及其总代表江亢虎所标榜的社会主义也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江亢虎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地税归公”。^④他曾多次申明，“研究土地支配方法，即可得社会主义之神髓”。^⑤社会主义——江亢虎的地税归公主张，实际上是根据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年在欧美流行的单税社会主义理论制定出来的。

① 申叔（刘师培）：《〈共产党宣言〉序》，《天义》报第十六至十九期合刊。

② 师复：《孙中山江亢虎之社会主义》，《民声》第六期。

③ 势伸译述、煮尘重治：《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新世界》第二期，1912年6月。

④ 江亢虎：《地税归公释义》，《社会星》第2期，1911年8月。

⑤ 江亢虎：《社会主义学说》，《江亢虎文存续编》，1914年。

以专征地税为核心内容的单税社会主义，在民国初年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对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它决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措施。因为专征地税的办法丝毫不能触动雇佣劳动的存在，制止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地是反映正在发展起来的工商业资本集团对土地强烈的欲望。马克思曾对单税社会主义作过深刻的批判，指出：单税社会主义“这整套理论不过是打算借社会主义为幌子来保持资本主义统治，其实也就是打算使资本主义统治比现在更广泛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①江亢虎领导的中国社会党正是这样的打着社会主义旗号，代表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

不仅如此，在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以后，江亢虎连“专征地税”的口号也不敢提了。他多次向袁世凯、黎元洪、赵秉钧上书，申明他的“社会主义”对袁世凯政府“有百利而无一害”，是属于和平派。他“不欲琐琐干预政府之行为，更无取而代之之野心。”^②在中国社会党的党旗上写着两个口号——“遗产归公”、“教育平等”，这就是江亢虎社会主义的实际纲领。从这一点来说，江亢虎的社会主义介绍倒退了一大步。正如李达同志在《社会主义与江亢虎》一文所尖锐指出的那样，江亢虎“所提倡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实是温情主义”，江亢虎“所号召的社会党人，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乃是一班不懂社会主义的人”。^③因此，尽管在民国建立以后，江亢虎和中国社会党的马克思主义介绍热闹一时，但是在群众中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在一九一三年袁世凯宣布解散社会党以后，中国社会党也随之一齐“消声匿迹”了。

综上所述，民国建立以后，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冲破重重阻挠，还是有了进一步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真正在中国传播开来。马克思主义还是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圈子里被歪曲和误解。中国人民还分不清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首先，在那时国内资本主义尚未发展，无产阶级还非常弱小。据统计，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我国仅有几十个近代工厂，产业工人还不到十万人。直到民国初年，中国的产业工人也大约只有一百万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工人阶级还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还不可能提出自己的独立政治口号和斗争纲领。因此，当时中国不具备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条件。

其次，在国际上，第二国际的领导糟蹋了马克思主义。他们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和革命精神，使中国人民难以辨别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什么是冒牌社会主义。尤其是他们把民族附属国的革命运动排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外，把民族问题限制在“文明”民族的狭隘圈子内，这样就使中国人民更难以有机会和可能去接受马克思主义。

（二）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地传播，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的。“十月革命一声

① 《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第148页。

② 江亢虎：《一九一二年五月致袁世凯书》。

③ 李达：《社会主义与江亢虎》，湖南《大公报》1923年8月14—21日。

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①十月革命在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东方被压迫民族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从此，中国才真正地出现马克思主义传播。

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地传播是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分不开的。首先，十月革命使世界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一个根本变化，它以实际行动证明了第二国际的破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十月革命的胜利，光辉地实现了列宁的思想，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这种情况大大地促进了同一切反社会主义的作斗争的事业，并给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一条通向被压迫国家最遥远的角落的道路。”^②其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忙于在欧洲进行战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较大的发展。随着中国近代化工业的发展，到了这个时期，中国产业工人迅速增加，从一九一三年的一百万人发展到二百万人左右，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队伍。五四运动以后，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显示自己的力量，这就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传播奠定了阶级基础。此外，在十月革命的帮助和影响下，从一九一五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也有重大发展，出现了一批赞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取代了资产阶级思想家，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坚与骨干，以他们为桥梁，马克思主义理论才真正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

十月革命以后，中国第一个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是李大钊。从一九一八年下半年起，李大钊同志曾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多篇文章，热情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李大钊在解释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时，就着重指出，“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按：即马克思）为宗主的。”^③在这里，李大钊同志旗帜鲜明地把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看作革命的社会主义，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看作革命的社会党。这就清晰地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论区别开来。接着，李大钊同志又在一九一九年五月，编辑出版了《新青年》“马克思研究”专号，在这一号上发表了著名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④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李大钊同志上述这些论文，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宣传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地传播的阶段。

十月革命以后，李达同志也是较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早在留日期间（一九一三——一九一八年），李达同志就积极参加留日爱国学生运动。一九一八年五月，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斗争，使他受到深刻的教育，决心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宣传。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他翻译了《唯物史观》、《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在国内陆续出版，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0页。

②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中间阶层》，《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360页。

③ 李大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5号，1918年11月15日。

④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第6卷5号。该刊在刊首标明出版日期为1919年5月，由于出版脱期，实际出版日期在9月，但有些文章的写成早于5月。

部分。一九一九年六月，李达同志先后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论述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不同，批判了无政府社会主义。李达同志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在主张上是不同的。社会主义者主张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是要组织一种社会主义政府，和那无政府主义根本打破政府组织是不一样的”。在经济上，“社会主义是主张全废私有资本，没有主张废私有财产”，因此，“把无政府主义置在社会主义头上，实在可笑得很”。^①从李达同志上述论述可以看到，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介绍不仅能比较正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也开始划分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区别了。

在李大钊、李达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推动下，各地的新文化刊物发表了大量的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从报纸上来说，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北京的《晨报》副刊都刊登了许多讨论社会主义与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和译文。一九一九年五月五日到十一月十一日，《晨报》副刊《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连续刊载了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其中《劳动与资本》是中国最早的译文。广东的《中华新报》也曾刊载了大量的译著，报道了一系列有关十月革命的消息和介绍了社会主义的原理，认为，“露西亚俄国之有李宁（列宁），而历史上顿增一种异彩”，^②俄国布尔什维克“主张之共产主义，最得平民劳动者之欢心”。^③许多报纸都用一定篇幅登载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的传记材料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消息。如《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一文，着重介绍了马克思以“其坚韧不拔之毅力和献身于世的精神”写作《资本论》的情况，并说明作者写作此文的用意是在于“引起诸君研究社会主义的兴味”。^④一九一九年八月七日至十一日，《晨报》副刊还以《新共产宣言》为题，发表了《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从刊物方面来说，北京的《新青年》、《每周评论》，上海的《建设》杂志和《解放与改造》也都刊登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文章。例如，北京的《国民》杂志从第二卷开始，登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章）^⑤、《鲍尔锡维克之主义底研究》^⑥、《马克思的历史的唯物主义》^⑦的译文，以及《苏维埃俄国底经济组织》、《苏维埃俄国底新农制度》^⑧等文章。《建设》杂志在创刊以后也发表了《社会主义国家之概略》^⑨、《近代社会主义之思潮》^⑩等文章。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一九

① 李达：《什么叫社会主义？》，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19年6月18日。

② 《呜呼：李宁》，广东《中华新报》，1918年9月14日。

③ 《李宁胜利之原因》，广东《中华新报》，1917年12月28日。

④ 《晨报》副刊，1919年4月1日至4日。

⑤⑥ 《国民》杂志2卷1号，1919年11月。

⑦ 《国民》杂志2卷2、3号。

⑧ 《国民》杂志2卷4号。

⑨ 《建设》杂志2卷1号，1920年4月。

⑩ 《建设》杂志2卷2号，1920年4月。

一九年四月六日出版的《每周评论》在其名著栏中刊登了《共产党宣言》^①第二章《无产阶级者共产党人》后面属于纲领的一段。这一段译文是《共产党宣言》中极重要的一段。因为在这一段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在译文的前面，还有一段按语。译者在按语中指出：“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他们发表的时候，是由一八四七年的十一月到一八四八年的正月，其要旨是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

当然，在上述的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中，也有认识模糊的（如黄日葵、恽代英同志的早期介绍社会主义的某些文章），或有错误观点的如蔡元培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甚至是敌视科学社会主义的（如《时事新报》上的《社会主义研究》专栏发表的某些文章）。但必须看到，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介绍是与以前的有根本区别的。

首先，从宣传和介绍的队伍方面来看，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成员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们或者主张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或者赞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或者信奉无政府主义。从根本上来说，他们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队伍发生了根本变化，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宣传社会主义学说时，有时也不够恰切。但是，他们倾向“俄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抛弃“法国式”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主张根本改造中国；反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最重要的是他们愿意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积极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在五四以前，李大钊同志就明确地提出来“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的号召，强调到工农民众中去宣传社会主义。在李大钊同志的倡导下，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走到工厂、农村调查研究了解工人疾苦、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工人团体。这是与十月革命以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根本不同的。

第二，从宣传和介绍的内容来看，十月革命以后出现了一批正确阐述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文章。如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李达的《马克思还原》等。这些文章都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以唯物史观作指导的，是主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和别家空想的社会不同的要点。”^②在李达同志《马克思还原》一文中还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原理归纳为七个方面，即一“一切生产关系财政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宗教、哲学、法律、政治等组织，均依这经济的基础而定”，二、“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力，发展至一定程度时，就与现社会中活动而来的生产关系财政关系发生冲突。资本家利用收集生产物的剩余价值，坐致巨富，劳动者仅赖工钱以谋生。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遂划分社会为有产者与无产者两大阶级。”三、“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资本制度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就与少数的有产阶级互相对峙起来”“互相联合组成一个大阶级，与有产阶级为猛烈的斗争。”四、“资本跋扈，渐带国际的倾向，而无产阶级的作战，亦趋于国际的团结。”五、“无产阶级的革命，在颠覆有产阶级的权势，建立劳动者的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六、无产阶级借政治的优越权，

① 舍：摘译《共产党宣言》，《每周评论》，1919年4月6日。

② 陈独秀：《马克思学说》、《社会主义讨论集》。1921年。

施强迫手段夺取资本阶级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劳动者的国家手里，用最大的加速度发展全生产力。七、“国家是一阶级压迫他一阶级的机关，若无产阶级专政，完全管理社会经济事业，把生产工具变为国家公产以后，则劳动阶级的利益，成为社会全体的利益。”李达同志这些论述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虽然还有一些不够妥切之处，但是却有力地说明了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认识已经有了重大发展。

第三，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和流传方面来看，十月革命以后也有迅速的发展。在十月革命以前，除了个别著作在杂志上刊载以外，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没有印刷或单行本。当时，中国人了解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依靠阅读马克思的传记。十月革命以后，不仅在报刊上摘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而且开始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单行本。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同年，上海群益书社出版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后半部分，原译名为《科学的社会主义》），1921年，人民出版社^①出版了马克思的《工钱劳动与利润》和列宁的《苏维埃的政权与建设》（原译名为《劳农会的建设》）、《论策略书》（原译名为《讨论进行计划书》）。尤其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译本出版后，曾一再翻印，广为传播，这都是十月革命以前所不能比拟的。和著作流行的同时，科学社会主义在高等学校中也扩大和巩固了自己的讲坛。从1920年起，李大钊同学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法律系和政治系先后讲授《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及讲座。这是在我国破天荒第一次开设的社会主义研究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不仅在中国知识界流行，而且也影响到其他社会阶层，甚至影响到反动派的军队中去了。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北洋内务部给陆军部的信中就说：“陕（西）省近日邮件中忽见一种印刷品署名兵士须知，系真理社刊行，其中同意不外提倡共产及无政府主义，并详述法国式革命与俄国式革命之区分。”^②

革命的真理是不可抗拒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可遏制地传播开来了，连当时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的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中国，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③

（三）

一九二〇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推动下，宣传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大规模的运动，马克思主义开始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摆在当时中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宣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推动学习马克思主义运动向纵深发展，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而斗争。

① 人民出版社，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出版社。

② 南京史料整理处藏：〔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1001）3227〕。

③ 潘公展：《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东方杂志》18卷4号。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兴起，不仅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极为恐怖，也使资产阶级深感不安。为了抵制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右翼分子互相勾结，散布各种反动思潮，向马克思主义发动猖狂进攻。一九一九年五月、一九二〇年九月，帝国主义御用学者杜威、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先后来华讲学，大肆散布反动的实用主义、社会改良主义；与此同时，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纷纷出动，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各种反动思潮的泛滥，造成在社会主义宣传上的一定混乱，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传播危害极大。为了捍卫马列主义，为了揭露各种冒牌社会主义的面目，当时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一九一九年七月开始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批判了胡适之流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谬论。一九二一年前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建党的理论。而通过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一年之间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从理论上和实际上驳斥了研究系分子鼓吹的中国必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谬论。进一步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按性质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进一步划清界限。它不仅要求当时的共产主义者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冒牌的社会主义，而且为了彻底揭露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本质，必须从根本目标、理想以及世界观等方面阐述科学的社会主义与一切空想的、冒牌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同，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在建党前后，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宣传。

以李大钊、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从党的创建时期就重视科学社会主义的学习和宣传。早在1919年8月，针对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胡适等人打着“多研究些问题”的幌子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谬论，李大钊同志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他多次号召青年学习布尔扎维主义即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指出，“布尔扎维主义，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它，把它的实像，昭布在人类社会。”^①毛泽东同志在确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后，也明确主张高举科学共产主义的旗帜。1920年，他在写给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说：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到了1920年下半年以后，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和各地建党工作的进行，越来越多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认识到，要建立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首先必须从思想上建党，大力开展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为了适应宣传和学习共产主义理论的需要，1920年9月，著名的革命刊物《新青年》改组为党的发起组机关刊物。该刊九卷一号发表李达重要文章，号召“结合共产主义信仰者，组织巩固之团体，无论国际的或国内的恶势力的压迫，始终为支持共产主义而战。”^②同年十一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草拟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强调指出

①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

②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9卷1号，1921年5月。

“一定要向工人、农人、兵士、水手和学生宣传”“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共产党的任务”，革命“才成功”。^①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从1920年11月以后，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先驱》、《少年》等革命刊物，进一步在中国树起了共产主义大旗，阐明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及与其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区别，为建设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共产主义者的理想 and 目的是什么？这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首先要弄清的问题。五四运动以后，由于社会主义学说的广泛传播，“社会主义，就变成最时髦的东西”，^②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纷纷打起社会主义的旗号来歪曲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成为含糊不清的概念。自称为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张东荪梁启超等人，打着社会主义研究的幌子，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并“偏重于攻击共产主义”；^③以区声白、黄凌霜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则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制度的区别，高唱立即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为了驳斥各种冒牌社会主义的歪曲和污蔑。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反复宣传了共产党人的理想和目的。在《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即“创造共产主义社会。”^④一切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家，必须承荷“共产社会创造的责任”，明确共产主义的目标，准备“为主义牺牲一切。”^⑤

当然，“共产主义不是一举而成的。”^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只是实行共产主义目标的第一步，“并不是说，一经革命以后，共产党有了政权的社会便是共产主义。”当时的共产主义拥护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驳斥了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歪曲。他们指出，共产主义可分为“半熟期”和“完成期”二个阶段。“共产主义底半熟期，就是共产主义底第一期。”在这个时期已经把一切生产机关都收归国有，所以就没有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区别了”，一切人都成为‘社会的劳动者’而劳动，各人都应其提供劳动的多寡从社会领多一定的报酬。这在每个人‘在别一个形式上取回同’在这一个形式上所付给社会的劳动’‘相等的分量的劳动’一点看起来，可以说是实现劳动全收权。是“进入了共产主义的时期”。然而这个时期，“因为他去资本主义社会未远，所以无论在经济上、在道德上，在精神上，在一切关系上，都还遗留着旧社会底遗风”；因此，“还有许多不公平的事情”，“强制力在这时期也还不能免除”。“至于分配消费品，还仅能采取‘各取所值’一条原则”。对于上列现象，共产主义者的态度是第一，这是刚从资本主义产出不久那些时候“所不可避的现象”。不能跳过这个时期，“要想一步跳过，那完全是梦想”；第二，这种半熟期的共产主义的还不是“马克思当做理想的社会”。只有共产主义的第二时期，即共产主义成熟期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自由社会”。“这个时期就是生产力已达了十分可惊的程度，完全能够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

① 《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1月。

②③ 许新凯：《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

④ 《中国共产党宣言》，1921年。

⑤⑥⑦ 施存统：《马克思底共产主义》，1921.8.14，载于《社会主义讨论集》。

自由共产主义的时期”、“就是‘各个都能够自由发展，全体才能自由发展的协同社会’！马克思所谓‘共产主义底更高级的状态’”。^①建党时期的共产主义拥护者上述论述，正确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联系与区别。既驳斥了社会改良主义从右的方面来歪曲社会主义，取消共产主义的根本目标，又批判了无政府社会主义从“左”的方面歪曲共产主义，取消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高级与初级两个阶段的谬误。

共产主义是伟大而又艰巨的事业。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必须要有一批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五四运动以后，涌现了一批优秀的青年革命者，为党的建立准备了组织基础。但是也有少数青年在“资本经济和思想侵蚀下”，“变得虚伪、狭窄、坠落、闹意气”，甚至“甘为官厅、军阀、资本家利用”。为了培养青年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情操。当时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向青年提出了“共产主义的修养”的要求。在该刊第二期刊登的《共产主义者所应采取的态度》一文中指出，革命家要“有革命家的人生观”。要“有革命家的特质”、“情操”。每个共产主义者应该重视自己的修养。因为“分子的行为，可以影响团体，有时分子不好，使人家连同团体的信奉的主义也不信任了。故须修养一个高尚的人格。共产主义是何等清白的一个名词，到了中国不要再把它弄污秽了。”作者还提出了革命家的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指出，革命家第一个条件是牺牲。“为主义牺牲一切”；第二个条件是“纯洁”；^②第三个条件是“血诚”，即什么生命牺牲，什么外人的无意味谩骂与讥评都不放在心中。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事业，每个共产主义者还必须要要有坚定信念。一九二二年，在中国的基督教会，掀起“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旗帜来蛊惑一般意识未定的青年。有的孱弱的共产主义者竟信仰基督教。他们认为，“宗教毫不妨碍我为共产党员——我信仰上帝，也一样的信仰共产主义”。《先驱》报在《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一文中尖锐地批判这种错误思想，指出，“宗教是人类的鸦片”，“共产主义与宗教信仰是不能调和”的，“科学社会主义对全体自然底判断支持在自然科学的结论上面，故在和一切宗教的谬说是不能妥协的仇敌”。当一个人“他既信仰上帝而又自称共产党员不能抛弃戒律以从党规，那么他已停止他的党员资格了”。^③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能否在中国实现，这是当时学习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必须解决的另一重大问题。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从欧洲传入中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蓬勃兴起，证明了它的正确，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并由此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的高潮。这种形势引起了马克思主义敌人的极大恐慌和仇视。在五四运动以后，以张东荪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打着研究中国国情的幌子，公开宣传中国当务之急是开发实业，而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叫嚷：“在开发实业的大要求下，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工场必日增一日，乃是不可抗的。”^④他们甚至要求帝国主义来“共同管理中国”，

① 施存统：《马克思底共产主义》，1921.8.14。载于《社会主义讨论集》。

② 《共产主义者应采取的态度》，《先驱》第二期，1922年4月。

③ 《基督教与共产主义》，《先驱》，1922年。

④ 张东荪：《现在与将来》，《改造》第3卷第4号。

“没有共管一层，绅商阶级是不会勃兴的”。^①针对张东荪等人的谬论，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以《新青年》、《共产党月刊》、《先驱》等刊物为主要阵地，从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二年发表了李达的《社会革命的商榷》、《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李大钊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蔡和森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②周恩来的《共产主义与中国》等文章，宣传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必要性。首先，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状况，指出由于外国帝国主义的侵入和本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国社会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已产生了新兴的无产阶级。他们与广大贫苦农民，不仅遭受本国的地主、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同时也遭到国际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掠夺。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更甚”，其“厄运，实不能以言语形容”，因而社会革命的必然趋势，甚至比工业发达之国更容易爆发。其次，共产主义者着重指出，“抄西洋人走过的路”，以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开发实业”不是解救中国的道路。因为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当时的中国是万国的商场，各资本国经济竞争的焦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发展实业，而是为了攫取巨额利润，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附属国。因此，“大家不要妄信经济组织及状况幼稚的国家仍然应采用资本制度”。^③第三，共产主义者强调指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不仅因为共产主义比资本主义有着无比的优越性，而且是因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后，“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④而在“共产革命期中，以无产专政的国家资本来发展实业，其成效当超过有产阶级竞争的资本主义万万，落后的许能赛过先进的，早成为工业极发达之国”。^⑤因而，当时共产主义的拥护者满怀信心地指出：“中国有行共产主义的必要”，“中国有实行共产主义的可能性”。^⑥“马克思底共产主义，一定可以在中国实行的。”^⑦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共产主义者高举着它，而当时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从实验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到无政府主义都一致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特别是无政府主义者打着“反抗强权”、“绝对自由”的旗号，反对一切国家、专政，反对一切组织纪律，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当时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共产主义者积极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谬论。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说明，“国家乃是一阶级用以压制别的阶级的强权机

① 张东荪：《一个申说》，《改造》第3卷第6号。

② 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

③ 《共产党月刊》，第5号《短言》，1921年6月。

④ 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评论之评论》1卷2号，1921年3月20日。

⑤ 周恩来：《十月革命》，《少年》第五期，1922年12月1日。

⑥ 无懈：《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共产党》月刊，第4号，1921年5月7日。

⑦ 施存统：《马克思的共产主义》，1921年8月14日，《社会主义讨论集》。

器”，“他的立脚点在阶级抵抗、他的作用在压制，他的属性在一个阶级，故要消灭国家先要消灭阶级，先要专政，集产、发达大工业”，^①若是象无政府主义者那样“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就是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②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人类生产力发达一定程度，被掠夺的生产者从资产阶级的高压中解放出来的唯一必然手段”，

“乃是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必不可免的历程”，在夺取政权以后，“无产阶级唯靠破坏资产阶级统治权，以本阶级的德谟克拉西，组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借政治的统治权，才能火速增进他们的行政、管理、自治的智识和技能”^③才能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对敌人实行专政；在无产阶级和劳动民众内部必须实行民主。在建党时期，中国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在《先驱》第三期刊登的《〈共产主义宣言〉的后序》一文中就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乃是对压制的资产阶级而言”的。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没有德莫克拉西可言，但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因要协调统治被支配阶级，故资产阶级自身之间，自有资产阶级的德莫克拉西，无产阶级自身之间，也有无产阶级的德莫克拉西”，即无产阶级的工农民主专政。这就正确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专政与民主之间的关系，驳斥了无政府主义的谬论。

建党前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实际上是关系到建立什么样的党的争论。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在当时的共产主义宣传中明确提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指出，共产党“主张阶级战争”，“主张劳农专政”，^④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消灭阶级，实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所谓不要政治斗争、不要专政和共产党领导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完全是反动的空想。

建党前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宣传获得了很大成绩。在宣传中，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坚决驳斥了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各种谬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了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可能性，明确地指出，中国应该建立共产主义政党。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进一步奠定了思想基础。

※

※

※

从上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中国人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年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才真正地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在这中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十九世纪末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爆发。这个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介绍的阶段。第二阶段，是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后到一九二〇年，这个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①② 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1号，1920年9月。

③ 《〈共产主义宣言〉的后序》，《先驱》，第3期，1922年2月15日。

④ 《共产党》月刊《短言》，见《共产党》月刊第4号，1921年5月7日。

广泛传播的时期。第三阶段，是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三年，这个时期，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开始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掀起了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运动。这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时期。

第二，马克思主义起初是作为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流派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介绍中，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到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作为系统的科学理论在中国大规模地传播开来。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学习宣传仍然占着重要地位。

第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经历了严重的斗争的。从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引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的恐惧。在这中间，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多次论战。通过论战，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广泛地学习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划清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胜利扫除了障碍。

第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中国人民一经获得马克思主义，就迅速而坚定地走上了正确的革命大道。从此，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展开了崭新的一页——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依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在中国的统治，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毛泽东同志说：“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入了博物馆……；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①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中，我们就感到了这种状况。展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宏伟蓝图，我们就更加看到这种状况了。